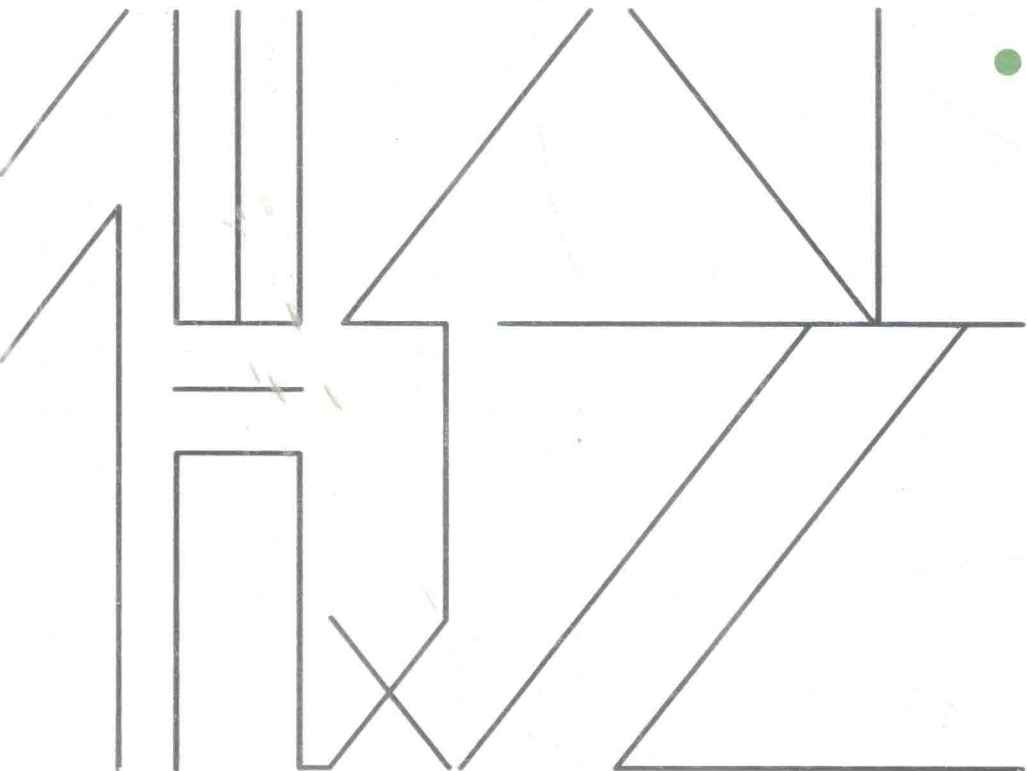




微光

青年批评家集丛

# 社会问题与 文学想象

从 1980 年代到当下

杨庆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

从 1980 年代到当下

杨庆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 从1980年代到当下/杨庆祥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 7

(微光: 青年批评家集丛)

ISBN 978-7-5321-6373-1

I. ①社…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5053号

发行人: 陈征

策划人: 金理

责任编辑: 余雪霁

封面设计: 胡斌

书名: 社会问题与文学想象: 从1980年代到当下

作者: 杨庆祥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

插页: 3

字数: 289,000

印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373-1/I · 5091

定价: 4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微光

青年批评家集丛

## “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策划人语

金 理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尝试获取对于“文学批评”的共识,恐非易事。不过,既然我们的集丛以此为名义来召集,势必需要提出若干“嚶鸣求友”般的呼声——

首先,文学批评“能够凭借自身而独立存在”(弗莱:《批评的解剖》),其意义并不寄生于创作,批评与创作并肩而立,共同面对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发言,“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这个说法来自陈世骧先生对夏济安文学批评特质的理解:“他真是同感的走入作者的境界以内,深爱着作者的主题和用意,如共同追求一个理想的伴侣,为他计划如何是更好的途程,如何更丰足完美的达到目的。……他在这里不是在评论某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客观论列一般的现象,但是话

尽管说的犀利俏皮,却决没有置身事外的风凉意,而处处是在关心的负责。”(陈世骧:《〈夏济安选集〉序》)

其次,在理性的赏鉴与评断之外,批评本身是一门艺术,拒绝陈词滥调,置身于“陌生”的文学作品中,置身于新鲜的具体事物中。文学批评应该是美的、创造的,目击本源,“语语都在目前”。

再次,诚如韦勒克的分疏:“‘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原理、文学范畴、文学标准的研究;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则要么是‘文学批评’(主要是静态的探讨),要么是‘文学史’。”但他尤其强调这三种方法互为结合、彼此支持,无法想象“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又怎能有文学批评”(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故而,凡在文学理论的阐释、文学史的建构方面有新发现的著述,均在本集丛收入之列。

丛书名中的“微光”二字,取自鲁迅给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借用“微光”大概表示两个意思:微光联系着新生的事物和谦逊的态度,本书是一套为青年学者开放的集丛;态度谦逊但也不自视为低,微光是黎明前刺破黑夜的第一束光,我们也寄望这套书能给近年来略显沉闷的学界带来希望。

此外,“微光”还让我们联想起加斯东·巴什拉笔下的“孤独烛火”,联想起巴什拉在《烛之火》中描绘的一幅动人图画:遐想者凝视孤独烛火,这是知与诗、理性与想象的结合。“在所有的形象中,火苗的形象——无论是朴实的还是最细腻的,乖巧的还是狂乱的——载有诗的信息。一切火苗的遐想者都是灵感丰富的诗人。”(《烛之火·前言》)——在这一意义上,“微光”献给“一切火苗的遐想者”。

集丛第一辑的六位作者皆为一时俊彦自不待言,我们也期待有更

多志同道合的师友加盟后续的出版计划。最后,集丛出版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陈征社长的鼎力支持,胡远行先生与林雅琳女史亦献策出力,尤其远行先生本是集丛策划者,但他甘居幕后不愿列名,这都是我们要特为致谢的。

2017年5月14日

## 目 录

### 第一编 80 年代：文学与社会的互动

80 年代：“历史化”视野中的文学史问题 / 3

在“大历史”中建构“文学史” / 29

——关于“重返 80 年代文学”

潘晓讨论：社会问题与文学叙事 / 40

——兼及“文学”与“社会”的历史性勾连

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 / 55

——兼及 1985 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

社会互动和文学想象 / 77

——路遥的“方法”

小屋的恐惧和救赎 / 89

——《山上的小屋》中的历史讲述

死去了的小资时代 / 102

——重读《波动》序言

阿三考 / 112

——由《我爱比尔》兼及王安忆的写作症候



寻找历史的缝隙 / 128

——关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述评与思考

“第三代诗歌”：命名与建构 / 146

## 第二编 “80后”写作：从成长中解放

“80后”与我们这个时代 / 163

——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的演讲

从成长中解放 / 181

抵抗的“假面” / 187

——关于“韩寒”的一些思考

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 / 199

——张悦然《家》中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想象

罪与爱与一切历史的幽灵又重现了 / 218

——由张悦然的《蛭》再谈“80后”一代

小说即“往生” / 233

——读蔡东

故事尽头,洗洗睡吧 / 242

——由《鬼雀》谈甫跃辉

读伤心的故事别伤心 / 248

回到现场的精神角力 / 253

——新世纪“80后诗歌”的美学倾向

### 第三编 21 世纪写作：对话与重建

历史重建及历史叙事的困境 / 261

——基于《天香》《古炉》《四书》的观察

重启一种“对话式”的诗歌写作 / 278

鲁迅的精神传统 / 290

——谈孙郁《鲁迅遗风录》

巨人行走于时空或少年敬泽的青鸟之旅 / 300

世纪的“野兽” / 312

——由邓一光兼及一种新城市文学

注释的审判 / 329

——宁肯的《三个三重奏》

- “辩证的抵抗” / 339  
——由胡淑雯兼及一种美学反思  
出梁庄，见中国 / 352  
“在天空中凝结成一个全体” / 362  
——《凤凰》的风景发现和历史辩证法  
截句：文体与意境 / 381  
“似乎都有余力再造一个世界” / 390  
——《五人诗选》序  
跨越时空的对话 / 397  
——第四届冯牧文学奖答谢词

代后记 通向真实的世界 / 403



第一编

80 年代：文学与社会的互动



## 80年代：“历史化”视野中的文学史问题<sup>\*</sup>

在一个被指认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2008年)来反思并重新讨论过去三十年的中国文学(1978—2008),这一举动本身的意味还有待于它自身的“历史化”,但从学术的角度来观察,这并不是一个突兀的事情,至少在2005年,对“这三十年”文学的历史性的考究工作已经展开,这里面既包括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式的介于“学术”和“畅销书”的方式,也有程光炜倡导并主持的异常细致、全面,甚至是有“野心勃勃”的文学史研究方式,在蔡翔、倪文尖、罗岗的《文学:无能

---

<sup>\*</sup> 本论文中许多材料、观点直接获益于我的导师程光炜教授主持的“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博士研究生讨论课,特此说明并致谢。

的力量如何可能?——“文学这三十年”三人谈》<sup>〔1〕</sup>的对话中并没有提到这些相关的研究,但我毫不怀疑这些研究对他们思考并切入问题的影响。这之间当然没有多么严格的因果相承的关系,如果有,我理解为在一个变动的历史时空里寻求问题解决之焦虑感,因为方向的不明确和对当下(文学)的不信任,只有把目光投向“历史”,就此而言,“这三十年”尤其是80年代文学似乎成为沟通现在与过去,沟通文学与社会、历史和政治等“庞然大物”的最佳对象。80年代文学,在今天变成了一个“问题文学”或者说“问题文学史”,它在叙述中被反复建构和解构,并隐喻着问题解决的希望。我从这里看到了进一步“对话”的必要性,或者说,蔡翔等人的“对话”激发了我的对话欲望,他们提出的问题和讨论问题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另外一些问题,因此,我试图通过对话的对话来补充、质疑和拓展现时代对“80年代文学”的理解,并加深对我自身所处历史时刻的含混性和可能性的同情。

### 一、“起源”作为一个问题

蔡翔等人的对话中一开始就讨论了“新时期文学起源这个老话题”:

---

〔1〕 蔡翔、倪文尖、罗岗:《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文学这三十年”三人谈》,该文分为两部分刊发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16日第37版和2009年2月23日第37版,标题分别为《八十年代文学的神话与历史》、《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我读到的是我的导师程光炜教授转发过来的电子版,本文中所引用的文字都出自该电子版本。

按照现有习惯性的叙述,整个这30年的文学发端于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当然,后来的研究还由这个共识上溯到“文革”的地下诗歌和地下写作了,而往下是到《班主任》和《伤痕》。这一路历史叙述在1980年代初的时候,似乎就已变成一个准官方和准文学史官方的叙述了。但是,到了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1990年代之后,这一种叙述越来越在精英学术界没了市场,大家往往开始强调汪曾祺的意义,强调“今天派”的价值。这一后起的竞争性的叙述看不上前者隶属于主流的政治性,让新时期文学的“头”跳过了整个1960年代、1950年代,而径直接上了1940年代,确乎汪曾祺一个人挑起了现、当代文学,接上了1940年代现代主义的轨。而关于“朦胧诗”“今天派”的言说,也越来越强化和“白皮书”、“灰皮书”,和西方思潮以及现代主义的脉络关系。

罗岗认为这分别是“政治角度”的起源描述和“文学角度”的起源描述。但是因为急于提出第三种起源描述,所以对这两种“起源叙述”的“起源”并没有深入讨论,这其实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在我看来,“政治角度”的起源描述可以追溯到邓小平的《祝辞》,在这样一个描述中,“新时期文学”是社会主义文学内部演绎的历史过程,它的资源是以“延安文学”为代表的“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其主要的意识形态目的是重建“社会主义新人”。而“文学性”的起源则是一种相对来说后设式的叙述,在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对“文学性”和“审美性”的极端强调要求在文学史中“寻找”或者建构起一个“纯文学”的历史起源,这一源头最终被定位在“白洋淀诗群”和食指那里,从而形



成一个“政治/审美”、“公开/地下”的文学史叙事模式。但问题是,很少有人关注以食指为代表的“文革地下诗歌”的“源头”,实际情况是,食指的诗歌风格、话语资源与“十七年”诗歌和“文革诗歌”有着割舍不掉的关联。比如那首广为传诵的《相信未来》,其风格上的抒情诗传统和形式上的格律诗传统和贺敬之、郭小川、张光年等的诗歌如出一辙,食指是否被夸大了他的诗歌史地位这是另外一个话题<sup>[1]</sup>。这里的意思是,罗岗等所谓的这两个起源实际上还是一种受到“文学史叙事”影响下的认识,这种二元对立式的叙事方式可能被刻意夸大了“差异性”,其后果是:现代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被叙述为两种绝然对立的文学形式和意识形态。像徐迟等人在早期讨论中所提出的中国式的“我们的现代派”(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合理性则被遗忘了。这里凸显的一个问题是,话语意义上的“起源”和实际的文学史的起源可能是有很大的出入的,(卡利内斯库讨论现代性时所谈到的)。“起源”叙述往往是出于文学史建构的需要,或者说是文学史叙述干预文学史的结果。如果不对文学史的叙事模式和编撰原则进行“历史化”的处理,就很有可能落入文学史叙事的圈套,而忽视了真问题。

之所以说“起源”问题是一个问题,主要原因还在于“起源”在历时性上的无限回溯性,也就是说,“起源”的上限无法划定。比如近年来讨论起源最常见的句式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没有十七年文学,何来新时期文学?”,但这个问题可以不断地排比追问下去,晚清文学是从哪里来的?晚清之前还有晚明文学,而晚明文学之前还有元明时

---

[1] 可参见程光炜:《一个被发掘的诗人》,《新诗评论》2005年第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